

是會計史研究的一大力作，對於家族企業史、經營史及社會經濟史等方向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其研究方法與路徑也為商業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曾旭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張亮，《南海回村：三亞回族的空間觀念與社會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85頁。

《南海回村：三亞回族的空間觀念與社會實踐》是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修改而成。此書雖篇幅不長，且作者張亮一再在後記中貶損自己的研究，但絲毫不影響這本書該有的學術價值。

在緒言和「經驗與理論」部份，帶着一雙獨有的民族志之「眼」，喜歡從社會事實出發來理解行動者的實踐及其更大範疇社會意義的張亮，主要圍繞三亞回族的時空觀念、社區建設、經濟生活、宗教社生活與身份認同五個方面來探究三亞回族的基本特徵。其中，他對海內外學者的中國回族研究及中國社會個體化理論有自身獨特的認知，既沒有陷入杜磊創設的「建構主義」陷阱，更對「個體化」理論有一種「回應」自覺。

在第一部份的歷史梳理中，他嫻熟運用田野調查獲取的民間歷史故事、碑刻材料、考古材料和族譜等各種形式的資料，參照「回輝話」的語言學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了三亞回族的基本歷史記憶及其認知。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文字材料和口傳資料都顯示三亞回族是從越南占城飄海而來的「番客」。身為人類學者，他敏感地抓住中國民族政策與三亞回族族群身份定位的相互關係問題，借助文獻與口述材料，指出三亞回族不僅不迴避「番客」的身份，還會對眾多的採訪者「建構」這套歷史記憶。自19世紀80年代接受「中國血統研究會」進行體質研究迄今，三亞回族群體已經接受了很多的外來研究者，因此對自身所處時空及族群歷史的表述，顯得應對從容。

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群體，三亞回族同樣通過積極承認並融入「回族」這一民族分類體系來彰顯自身的國家與民族認同策略。張亮對此總結說，三亞回族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後，已經形成一種族群自我認同的能動邏輯，這種邏輯伴隨着其社會發展的始終。在他看來，三亞回族的時空觀念不僅需

要延續歷史記憶的諸要素，同時還要在中國大的民族政策環境中形塑出一種最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身份特徵。因此，儘管很多國外學者都在批評中國民族政策具有的「建構」色彩，但是三亞回族人基於自身的發展訴求，很快就在自身族群身份特殊性與國家民族政策間取得平衡，不僅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迅速定位自身，還在這種身份塑造的過程中重整了歷史記憶，集體意識得到加強。

由此，儘管作者此節未對「個體化」問題進行討論，但借由三亞回族這種「社會團結」方式，無形當中回應了中國社會「個體化」理論的一些基本要素。

面對各式各樣的外來者，身處旅遊開發區的三亞回族不僅建構出一套獨特的歷史記憶系統，同時，還在自身的社區建設上形成形式與宗教的雙重特性。一方面，三亞回族很早就開始「國家化」，積極融入到大一統的國家建設中，成為「編戶齊民」。在現代社會，他們也通過基層組織的運作，實現作為國家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權益。另一方面，他們自發形成回輝助學會和古爾邦節慶典兩個民眾組織。回輝助學會每年八月給需要補助的學生發放獎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區的教育水準；古爾邦慶典包含的各類活動，則讓社區居民在宗教組織以外擁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團體。正如張亮所言，儘管開展古爾邦慶典過程中，包括運動會等在內的很多活動都是國家主流價值觀的一種投射，但是通過一系列的活動，他們擁有更多社會活動的空間，讓我們看到三亞回族在自身社區建設上的多維性。

三亞回族的民間組織之所以得以成立並有效運作，與當地的經濟建設密不可分。自改革開放之後，原本處於「靠海吃海」生計模式束縛下的三亞回族，逐漸調整自身的經濟行為，逐步轉向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人們借助三亞開發旅遊的東風，在房地產、旅遊商品銷售、餐飲服務業等領域逐漸展示出其經商稟賦，從而成為三亞當地「最富裕的農民」。

在商業上不斷取得成功的過程中，三亞回族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兩個大問題：一是社會內部的兩極分化日趨加大；二是國家對市場規範的介入，促使很多人需要重新調整自身的經營策略，回到國家允許的市場規範下從事經營。據作者的觀察，三亞回族面對這兩種趨勢，都做出較好的回應，在「全民皆商」的集體意識下，很多原本沒有專門經營生意的人，開始利用閒暇時間開展各種各樣的副業。原本那些較早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此時無形中為後來者提供了一種商業氛圍，市場機遇的大量存在，為後進的經商者提供無形的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三亞回族商人面對國家市場規範化的要求，主動調整經營策略，以更好地符合政策安排。透過這種轉型，我們可以看出三亞回族在商業經營模式上已經擁有屬於自身的一套體系。

作為穆斯林群體，三亞回族的宗教生活亦是作者關注的重要內容。通過考察三亞回族的日常宗教實踐，他指出三亞回族圍繞宗教信仰形成穩定的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還會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發生變化。當他們需要言說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時，就強調自己是回族；如果需要突出宗教信仰，則會強調伊斯蘭教信仰。在宗教與族群身份之間，他們已經建立了一種遊刃有餘的言說策略，從而使得其對外交往中獲得更多的資源。

為了顯示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三亞回族用「aza」代表信仰伊斯蘭教的「我群」，而用「alo」指涉非穆斯林群體。但在充份表達自身族性的同時，他們也不斷地通過對外的宗教交流來表達其與大陸及海外穆斯林之間存在的共通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三亞回族在身份認同上凸顯其表達智慧。他們非但沒有因為強調自身族群身份的特殊性而游離於國家民族體系之外，還通過宗教文化交流等活動，很好地融入國家認同與共同價值之中。作者以此說明，強調族群文化的特殊性與國家民族同一性要求可以並行不悖。

基於上述幾個內容的考察，張亮在最後部份對三亞回族從「多民族國家中的群體定位」及「社會轉型中的集體策略」進行總結，指出三亞回族雖在語言、文化和宗教等層面有特殊性，但通過積極融入到國家主流的民族話語中，很好地實現了自我延續。

與此同時，在「國家」與「市場」的外力作用下，三亞回族所堅持的伊斯蘭文化傳統的「教坊制度」不斷被瓦解，而城市化的腳步也不斷挑戰他們的居住格局。面對此種情況，他們堅持從自身文化內部尋找社會團結的動力，通過「結成社會集體的方式參與社會資源的分配」。由此，三亞回族非但集體意識未被消解，而且在這種應對外力的實踐過程中更加團結。最後，張亮將這些年對「清真」這一概念的探索成果置於文末，以為本書的基本觀點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

2016年初，《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集中刊登了周明甫、何明、范可、張小軍等幾位學者的文章，集中討論中國民族研究範式危機議題。其中，何明認為民族研究的危機主要體現在學科認同、學者信任和體制建設上，而要破解這樣的危機，則需要在「民族」概念的重新理解、研究民族社會事實的解釋路徑、區別民族學與人類學關係及促進管理體制轉變等方面做出努力。（〈民族研究的危機及其破解——學科認同、學者信任和學術

體制的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56-59、190）范可認為民族研究的邊疆範式已經成為學術緊身衣，需要對此加以注意，尋求民族研究新的突破口（〈族群範式與邊疆範式——關於民族研究範式轉換的一些思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59-63、190）而張小軍則指出當下的民族研究存在「民族單義性」、「民族問題化」及「去民族」等三種範式危機（〈「民族」研究的範式危機——從人類發展視角的思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73-82、190）。

張亮在創作本書之時，雖未直接在緒言中直接回應上述諸位學者談及的民族研究危機問題，但卻無意中讓我們看到解決當下「民族研究」尷尬處境的一種取向。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他很敏銳地抓住做「特殊民族」研究需要對話的核心領域。在不斷深入到三亞回族自治州生活方方面面的過程中，他沒有像很多中國學者那樣，要麼成為國外建構論者的擁躉，要麼毫無反思地沉迷於民族文化同質性的論述，而是從中國社會個體化轉型的大背景出發，力圖從三亞回族自治州的社會實踐事實中理出其表述自身的話語體系及應對國家轉型的行動邏輯。這樣的選擇，既滿足了人類學對於社會文化普遍性原理的一種探求，成為我們開展「跨區域」民族志研究的一個起點，同時也為回族自治州研究拓展新的路徑做出一個有益嘗試。

當然，作為只有不到兩百頁的小書，書裡的觀點雖然很鮮明，但是由於省去了很多素材，因此所呈現的不少重要觀點的表述是有點生硬的。全書除了第三章討論的時空觀念放了較多文字素材之外，其他章節都寫得非常簡潔。對於缺乏對回族自治州及穆斯林群體深入了解的普通讀者而言，包括三亞回族自治州的宗教生活、經濟生活和社區活動等在內的諸多社會事實只能是似懂非懂，無法跟着作者的腳步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不過，這並非作者個人意願，而是一些客觀因素使然。但願我們還能有機會看到張亮的博士論文裡精彩的田野素材得以更全面的展現，給我們一個更加有血有肉的三亞回族自治州。

覃延佳

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